

目 录

- 一、乐昌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活动简况
.....廖治金 (1)
- 二、《时间报》话旧.....梁伯彦 (3)
- 三、抗战时乐昌军警处见闻.....梁伯彦 (8)
- 四、记抗日时乐昌县干部训练所.....
.....梁硕之 (11)
- 五、从一七七医院到第九军官总队退役的回忆
.....陈 劲 (14)
- 六、国民党的乐昌县监仓见闻.....
.....潘元旺 (20)
- 七、建筑南岭支线铁路梗概.....刘玉泉 (28)
- 八、抗战时期乐昌的生产信用合作社...
.....甘锡军 (38)
- 九、随陶铸同志视察九峰.....朱逸之 (41)
- 十、岐乐——全国农村卫生红旗纪略...
.....龚衍瑞 (47)

- 十一、陈公博生平简介……………韦 文（ 52 ）
- 十二、话说陈致美……………
……………陈翼亚口述 廖炳煜整理（ 58 ）
- 十三、“国大”代表廖介操其人……………
……………杨民生（ 60 ）
- 十四、张兹闾纪略……………韦 文（ 65 ）
- 十五、从建“义仓”看张祖炳的政绩…
……………甘锡军（ 66 ）
- 十六、徐锡勋即兴吟对……………陈家辉（ 70 ）
- 十七、清末民初乐昌县的两个“有钱佬”
……………赖 东（ 71 ）
- 十八、宋驼子的传说……………王纪抄（ 72 ）
- 十九、薛岳与宗元小学校……………陈家辉（ 74 ）
- 二十、公博小学校始末……………
……………陈翼亚口述 杨民生整理（ 78 ）
- 二十一、乐昌中学抗击土匪纪实……………
……………张苏平（ 81 ）
- 二十二、南岭煤矿的匪患……………刘玉泉（ 83 ）

二十三、民国时期乐昌县的粮市概况·····	江萃华 (87)
二十四、解放前乐昌县办长途电话的变迁 ·····	包应祥 (91)
二十五、乐昌县电报通信梗概·····	《乐昌县邮电志》编写组 (93)
二十六、解放前乐昌杉木产销概况·····	陈祖荫 (97)
二十七、更正·····	(101)

乐昌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活动简况

廖 治 金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是苏联革命领袖、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同志逝世两周年纪念日。国民党乐昌县党部和驻乐昌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团团党部，联合发起乐昌各界团体举行纪念活动。

一月中旬，县党部和驻乐昌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团团党部，联合召开了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大会的筹备会议，各界出席筹备会议的共十二个团体四十多位代表。会议选举朱耀华、彭侃等十五人为筹备委员，组成纪念活动筹备小组，负责筹备纪念活动的各项工作。同时就开展纪念活动的时间、内容安排等事项作出了如下四项决议：

一、纪念活动举行四天，每天上午九时至下午一时开大会，下午二时至六时连演锣鼓剧，晚上演白话剧，中间插入演说。

二、第一天举行列宁逝世两周年纪念大会和反对日本出兵侵略南满示威游行。做小彩旗三千支。

三、组编六个宣传队，每队五人，沿街逐巷进行宣传。

四、到韶关印纪念列宁传单七千张，到时散发，扩大宣传。

各界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活动的筹备工作於一月二十日就绪。一月二十一日纪念活动正式开始进行，上午九时举行

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纪念报告会。地点在南湾庙的大坪上，大会按程序进行，行礼如仪，默念致哀后，先由大会主席讲话，次由代表演讲，最后列队上街示威游行。

纪念大会会场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悬挂着列宁遗像，会场四周遍贴标语。参加纪念报告会的有驻军一团官兵一千二百多人，乐昌各界人士一千五百多人。他们手持小红旗，分工农商学兵等列队进场，走在最前面的为军政界队伍，他们步伐整齐，走到主席台前正中处站列。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团团长朱耀华自请担任纪念大会的执行主席。会上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团政治部主任彭侃（解放后在湖南省文史馆工作）宣读了乐昌各界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大会的《为列宁逝世两周年纪念告民众书》。《告民众书》说：

“今天是我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导师、反对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首领、孙文主义的好朋友列宁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日，……亲爱的同胞，我们要记住列宁的遗训，联合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

会后列队示威游行，散发传单。游行队伍不断高呼口号：“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俄联合万岁！”“列宁主义万岁！”“孙文主义万岁！”“国民革命成功万岁！”口号声彼伏此起，场面甚为热烈。

当天下午，在学宫进行纪念文艺表演。一连四日，演出花鼓戏和白话剧。纪念活动搞得异常隆重。

注：

本文整理时，得到湖南省文史研究馆提供具体细节资料，於此一并致谢。

《时间报》话旧

梁伯彦

读了《韶关文史资料》第九辑发表的郑衡撰述的《时间报》忆旧一文，使我引起了不少的回想。《时间报》的存在和消失虽然超越了四十多年，但有些往事，迄今犹历历在目。

我们几个年青人，在没有后台、没有资金的情况下，竟然办起一份报纸——《时间报》（三日刊）来，还在当时社会上发生过一定的影响，所依靠的全是一股抗日救国的热情。当时的时局大势是这样：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一九四一年发动南进，突袭珍珠港美军基地，出兵占领香港、新加坡、东南亚一带，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的气焰十分嚣张；而国内蒋介石又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局面临近分裂的危险。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我们年青人大都沉不住气，所以一经郑衡同学的提议，仅仅经过三个多月的筹备，这份报纸便公开与读者见面了。

要办报，首先要向广东省图书杂志审查处申请，领取出版登记证。该处处长杨德隆与我当时担任乐昌县长的堂叔梁汉耀，是中央政治大学政治系的同班同学，同是CC派中人，关系比较密切。杨的妻弟李敏新，那时是乐昌县政府教育科长，跟我是同事，我是通过李敏新向杨疏通，杨又知道我是梁汉耀的堂侄，所以很快便批准下来。有了出版证，就得找

纸张和印刷。我内兄雷鲁萍在乐昌县城郊开有一间中光印刷厂，我与他商量，他答应代印，只收回成木，而且可以先印报后付款，只要我们能够拿出钱去买一批白报纸就行了。因为便于领证和日后与各方面打交道的需要，社内推选我出任社长，其实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工作人员，除写稿、组稿和编辑外，连搜集剪贴资料和校对工作都兼而办之，我每天下午一下班，便赶到印刷厂跟排字工人一起排字、排版、逐段校对，往往搞到三更半夜才去休息。因为我们采取在乐昌印刷运至韶关发行的办法，我在乐昌送报，郑衡在韶关接报。还记得当第一、二期的报纸印好时都在深夜，我们用肩挑，用手挽，加快脚步急急忙忙地将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报纸送到火车站，以便第二天一早发到报贩手里，在大街小巷叫卖。凡是出报的前一晚，我们都很劳累，但看到报纸能及时出版，依时送到火车站时，我们又感到莫大的快慰。这点心情，有点象母亲看到自己初生的婴儿一样。

我们没有办报的经验，对编辑、发行和广告业务等多不熟悉。韶关当时是战时省会，新闻阵地由第七战区政治部的《建国日报》，国民党省党部的《中山日报》，省政府的《大光报》三大报所垄断。我们的《时间报》异军突起，钻进这个新闻圈内，自必引起社会人士的关注。《时间报》的四个版面，各具特色，郑文中已有介绍，兹不复赘。我们与韶关三大报不同之处甚多，显而易见的是较多地转载新华社、路透社、美联社等比较客观的报道。我社通过内线订阅了一份在重庆出版的，但被国民党政府禁止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不少材料是引用这份报纸的。其次是编排新颖，我们那时已懂得象今天的报刊那样在标题上面加上眉题，在标题下面加上概括性或启发性的简短文字。因此，很有吸引

力。

在出版初期，由于本报在社会上尚未产生影响，加之报贩公会从中作梗，有些报贩不愿意代卖。记得有一次，我曾和郑衡、林风等人约定十多个青年朋友在一个早上分别向韶关的各大马路以及东、西河坝、五里亭、十里亭等地出发，见到《时间报》就买。本来《时间报》零售价每份五分，最初发给报贩每份四分，后降至三分，经过这一次“抢购”，收回二、三百份，给报贩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同时，本报又在韶关电影院播放银幕广告，在每晚放映电影片之前，介绍本报主要内容和出版日期，引起读者注意。我们一因人手少，又因没有经验，在出版了几期之后，便把承接广告和推销发行的业务，委托开设在韶关市西河坝的英明行代理，该行负责人施伦佐，新会人，抗战胜利后曾在胡志明主席领导下的越南政府新闻部工作过。我跟施虽有点亲戚关系，但他欺负我们缺乏社会经验，侵占了我们不少款项，使我们蒙受损失，现在回想起来，算是一个教训。

我记得《时间报》是在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创刊，六月初才被韶关警备司令部勒令停刊的，已出过四十多期。郑文说出版不过三个月，是否记错，尚待查证。被勒令停刊的理由是：“报道失实，言论偏激，蛊惑人心，应予停刊。”在发出勒令之前，杨德隆曾通过梁汉耀和李敏新向我警告过，要我不要替共产党宣传。我自问宣传抗日救亡，出于国民天职，并无过错，不分什么党派，都应该以此为第一要务。虽然如此，我还是写了一篇《论目前的民族文化建设——建立三民主义理论的文化体系》，全文四千多字，在专论版发表，（此文编入拙著《文学新论》，作为附录。）表明本报的立场，才容许继续出版。据我所知，警备司令部之所以对本社

下毒手，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一件事是导火线，也可以说是近因。那是韶关市民生路第七战区长官司令部附近的重大失窃案。这宗失窃案，损失物资一大批，价值巨大，因为失窃地点正在司令部相隔不远，军警林立，若揭露出来，面子很不好过。韶关三大报对此只字不提，本报因在乐昌印刷，避过了审查官员的眼睛，如实地反映出来，轰动一时。其实，郑衡的一系列抨击时弊的杂文和我所写的同类文字有漫话政治内幕五篇：《论灰水政治》、《论科员政治》、《论金钱政治》、《论裙带政治》、《论字纸政治》等，均刺痛了反动政府的要害，所以非扼杀不可。

《时间报》（三日刊）存在的时间虽然只有四个多月，但是在读者中间，特别是在青年读者层有一定的影响。现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当时作家张天翼（抗战初期文学名著《华威先生》的作者）在湖南身患肺病，生活发生困难，我们知道这个讯息后，遂在本报刊出募捐启事，一个多月便收到读者二百多人解囊捐助了一批钱，由报社转去。

《时间报》（三日刊）突然遭到勒令停刊，我们一时感到茫然，心理打击甚大。经过本社同人磋商，决定撤退到乐昌，另起炉灶。又用我的名义向乐昌县政府申请开设时间通讯社，出版《时间周刊》，我找县府社会科钟科长（忘其名，他是乐昌人），谈话多次，终获批准。（三日刊）与（周刊）不同之处，不止出版周期有差异，且内容变动亦大，前者以报道战况、评论国家大事为主，选登文艺作品为辅，后者以发表文艺作品为主，报道各地通讯为辅。因为不是如此，就无法立足。通讯社的社址设在乐昌县民众教育馆内，馆长蔡雪卿是县府秘书余克西的妻子，跟我们有一定的交情，对我们开展工作亦多予协助。通讯社在省内各地聘请

一批通讯员，经常向本社反映当地的抗日战争和人民生活的情况。我们收到这些来稿后，除了有部份在《时间周刊》发表外，还经过整理向其他报社发稿。我记得（周刊）发表过一篇《潮汕人的自白》，这篇通讯是潮阳县通讯员寄来的，文长四、五千字，分三期刊完，文内主要是报道潮汕沦陷区人民生活的苦状，又涉及到有个别客家人为日军作翻译、为虎作伥的情况，客家人见报后十分恼火，认为是有意中伤，过去积怨已久的潮汕人与客家人的宗派纠纷便又挑动起来。韶关兴梅同乡会向韶关地方法院提出控诉，法院曾发传票着本社派员到庭受审，后因证据不足，此事遂不了了之。

以上所述，算是我对郑文的一点补充。



（上接第27页）

口烧起一堆火，那个作过监犯的须从火上跨过入店。那时我家开的福和丰旅店离监仓不远，我父亲因坐过监认识了一些犯人，也很同情那些犯人的监仓苦楚生活，对出监的人来住房，都热情招呼，不出难题，故来我家住宿的不少，不过跨火避邪与烧炮仗的手续仍是例行的。

抗战时乐昌军警处见闻

梁伯彦

抗日战争时期，乐昌县处在战时省会韶关市的后方，由韶关开出北上汉口的粤汉铁路火车经过乐昌，在县城和坪石镇设有上落站。乐昌又处在湘粤两省之交界，境内有公路可达粤北各县，又有水道由湖南经乐昌至韶关，注入北江向南流去，交通尚称方便，因此地位也十分重要。

乐昌当时的治安，仅靠县警察局的一百多名警察是无法维持的。因外来避难求业的人日益增多，而临时设在乐昌的军事机构亦不少。例如县城，就有军政部第三补充训练处设在那里。该处是负责接收和训练新兵的，相当于师一级的编制。其所属官兵的行动，县政府无权过问。在县城和坪石，又设有伤兵医院多所，因为给养不足与管理不善，这些伤兵经常走出街头闹事，跟老百姓发生纠纷，县府难于应付。加之有的在外地抢劫、杀人的案犯流窜到乐昌，以为藏身之所，逃避追捕，情况就显得更加复杂。

粤汉铁路警备司令部有见于此，遂于一九四一年底，成立粤汉铁路警备司令部乐昌军警巡察处，由警备司令部中将副司令吕鉴周兼任处长（吕当时带有眷属住在乐昌县城），县长梁汉耀兼任副处长，所有驻在乐昌境内的军警一律归其节制。其内部编制和工作内容如何，我不大清楚，希望知其内幕者加以充补。我只就表面上看到的和听到的事情略谈一

二。

当巡察处成立之后，街上张贴了布告，让百姓们知道有这么个组织。过了不久，时不时看见有擎着巡察处名义的旗帜的小队伍，在城内穿街过巷，执行巡逻任务，尤其在冬防时，频频出动，对维护社会治安，起到一定的作用。我记得，有一次县城的伤兵医院有几个伤兵，在街上向农民购买挑运出来的农产品，没有给予公平的价格即行拿走，带有压价强买的性质，农民不甘示弱，与之抗争，至而引起双方斗殴，伤兵自恃人多势大，夺过农民的担杆，将农民打昏在地。路人看见，均为之不平，纷纷向县城警察所报告。警察所遂派出警察，将为首肇事的两个伤兵带回警察所拘留审讯。这本来是一种正常的办公手段，但这些伤兵倚仗自己抗战有功，身受枪伤而得不到政府的妥善照顾，早已积怨在心，一旦发生警察拘捕伤兵之事，不禁怒火中烧。乃纠合一百多个伤兵，冲进警察所，大吵大闹，要警察所立即放人，并要向伤兵赔礼道歉，吓得警察所长李宰荣跑到县府向县长梁汉耀请示处理办法。梁汉耀先打电话找伤兵医院的领导，该院领导诸多推挡，不愿出面处理。梁汉耀遂又向军警巡察处告急，由该处派出一分队人马，赶到警察所把伤兵驱散，才得解围。此事闹了大半天，县城居民无人不知。

还有一件事是我亲历的，也值得一提。那时我在县府负责出纳庶务工作，一个月內总有一、两次下韶关采购办公用品，多数是在周末晚饭后，搭一个小时又十五分钟的火车到韶关，第二天购齐东西后，于星期日晚上再搭火车返乐昌。有一次，我带同一个工友到韶关采购，当回来时，已是晚上七时多，工友手上挽着两大捆纸张，我拿着一些蜡纸、油墨之类，行出车站闸门不远，忽然听到有人大声喊话：“请乘

客们注意钱包，小心扒手！”我年轻幼稚，缺乏出门经验，听到这喊话之后，立即主动用右手将裤袋的钱包握住，这无疑给坏人暴露目标，正好中计。突然间，有几个人向我身边碰来，把我挤得喘不过气来。等我的手头一松，钱包已不翼而飞了。我上火车后即已发觉，钱包内除了有十多张购物发票外，还有现款数百元（相当于现在人民币值二百多元），心情一时十分惆怅。次日上班时，我便将上述情况向县长梁汉耀会报。梁汉耀听过会报后，马上打电话给巡察处。听说巡察处派出人员知会韶关市警察局，召集火车站所有的扒手开会，公开讲明这是公家的款项，任何人都不能侵吞，谁作的案谁须主动如数交出，不追究刑责。以三天为限，如不交回，则从严处理。这些扒手们互相检查，都认为此案与自己无关。三天之期限将到，他们急得如丧家之狗，为了了此公案，免得惹火烧身，由各人自动凑足款项交到韶关警察局，转来乐昌巡察处，通知我去领回。事后得知，这次作案的确实不是盘踞火车站的那些“地头蛇”，而是别处临时流窜到韶关的扒手。这几个扒手后来在湖南长沙落网，供认出有过这回事，但窃得的款项早已花光了。于此也可见巡察处具有的威力。

因为梁汉耀兼任巡察处副处长的关系，县府领有几个巡察处的铜质圆形刻字的证章。佩带这种证章乘搭乐昌至韶关的火车，可获免费优待。县府有时有人下韶关工作时，可到警佐室登记借用，用毕送还。

记抗日时乐昌县干部训练所

梁 硕 之

乐昌县干部训练所是一九四〇年成立的。那时正处在抗战时期，广州及珠江三角洲一带已陷入敌手，韶关市成为广东省临时省会，省政府和省保安司令部及其所属机构，均设在韶关市郊外的黄岗、犁市等处。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出身军人，他为了适应战时工作的需要，成立了广东省干部训练团，亲自兼任干训团团长，派陆冠莹为教育长，抽调各县市科级以上公务人员分期分批到该团受训。各县市同时成立干部训练所，抽调各乡镇基层工作人员轮流训练，灌输战时有关法令和岗位业务知识。

一九四〇年底，省干训团派陈榕亮来乐昌筹办县干训所。陈榕亮又名述同，惠阳县人，毕业于中山大学。他来乐昌后，经过几个月的奔走筹备，找到了县城内一间破旧的祠堂作为所址，把县干训所的招牌挂了出来。其编制如下：所长由县长梁汉耀兼任，教育长陈榕亮，下设三个股，教务股股长梁灼南，恩平县人，中山大学毕业，亦是省干训团派来的。训导股股长一时未找到人，暂由梁灼南兼。总务股股长由县政府财政科长陆植森兼任。还有教务员、训导员各一人，科员、办事员若干人。而实际工作，则是由陈榕亮、梁灼南二人负责。按省干训团规定，县干训所教育长可挂上校军衔，股长可挂中校军衔，列入战时编制。我见到他们衣

服上所佩带的布质胸章，是黄边加上几个星的。（上校是黄边三个三角星，中校是黄边两个三角星。）

一九四一年春季过后，干训所正式开学，第一期只办一个班，叫乡镇行政人员训练班，到来受训的有各乡镇抽调来的乡、保长约三、四十人。开学那天，由县长兼所长梁汉耀出席讲话，由教育长陈榕亮会报筹办经过和今后开展工作的设想，省干训团亦派员由韶关上来参加。县内各部门的主管和地方士绅也应邀到会。开学仪式颇为隆重，会后梁汉耀还请到会人员到昌华酒楼吃了一顿美餐。

受训学员，一律集中食宿，其经费由县府拨款支付。每天一早，吹哨子起床，洗面后，即举行升旗仪式，接着进行简单的军事训练一小时，然后进早餐。早餐后便开始上课，授课内容除按照省干训团发下的课本外，另由教务股参考当地情况编写一些补充教材。上级发下的课本，由陈榕亮、梁灼南分别讲授，其余则聘请该县属各部门的科长、主任等业务主管担任，例如讲乡镇行政则请民政科长讲课，讲文化教育则请教育科长讲课，讲税务工作则请县税捐征收处的副主任或科长讲课，讲征粮工作则请县田粮管理处的副处长或科长讲课，如此等等。以三个月为一期，结业时发给结业证书。以后继续办过户籍人员训练班，小学教员训练班，乡队附训练班之类。（各乡镇均设有专职的乡队附一人，协助乡镇长办理征兵工作，归县国民兵团团部管辖。）得到过迁到乐昌办学的中山大学医学院的大力帮助，他们派出人员办过卫生人员训练班、助产士训练班几期。

由于经费不足，所内的设备十分简陋，所用台凳和床铺，大多向县属各单位借来，新置的很少。有时遇到大风雨，课室漏水，无法上课的事曾发生过多。县府为此向省

府及省干训团请求援助，虽然也拨来一点款项，但数目不多，大部分开支如学员的膳费、教员的补助费等，仍须由县府设法筹措，故一年间只能开办两期，每期只能办一至两个班，其余的时间大都空着，使有些工作人员没有工作可做。

我记得陈榕亮只办了一年多，即调离乐昌，继任教育长职务的是梁庭光，四邑人，也毕业于中山大学。梁庭光约一年左右又离去，接手的是朱权，听说他是冯玉祥将军的义子。以上提到的几位教育长、教务股长，到乐昌时都是三十岁上下的青年人，他们有学识，有救国热情，办起事来很有朝气。可惜局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而且经费又左右支绌，以致未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就事论事，这个干训所灌输的知识，表面看来虽然是为了巩固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但也为稳定战时大后方的社会秩序，以便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能说不发生过积极的作用。一九四三年夏，梁汉耀被省府免职，我于办完移交工作后，即离开乐昌，干训所以以后有无继续存在，就不得而知了。



从一七七医院到第九 军官总队退役的回忆

陈 劲

我在《乐昌文史》第四辑中谈过抗战后期的一七七医院，现追忆抗战胜利后，一七七医院人员，离开龙南以后的一段概况。

奔老隆继续任军医

一九四五年抗日胜利后，一七七医院接到第七战区总监部的命令，着即从江西省龙南县开回韶关待命。这时虽然人人衣衫褴褛，但个个神情兴奋，整顿行装，踏上归途。十月回到韶关，住在黄田坝的一些杉皮棚里，闲着无事，大有时间去寻亲访友，见到熟人，莫不以光复重逢，相互庆贺，谈到沦陷颠沛流离，又莫不感慨满怀。不久，总监部发来“胜利奖金”，人人精神为之一振。我在领发“胜利奖金”之列，以上尉军医的名份，领到大约相当于三钱黄金价值的“胜利奖金”。随后，医院按总监部命令，原班人马到龙川县老隆镇继续办医院，如不愿去者，听由“尊”便。在黄田坝这段时间前后仅个多月。

因为不是硬性规定必须全部集中统一开赴老隆，只要求